本文应该是全书视野最为宏大、问题最为重要、论述最为简括的一篇，展示了作者广阔的见识，以及为读者呈现了这一问题较为前沿（尚不知本书出版后（2007）十五载的今日，学界是否有所发展）的综合性回答。虽然本文采用了政治、经济、社会这样分点式地回答，可能有失去整体感之嫌，但在没有更好的综合，以及冲突的意见未平息前，这不失为一折衷方案，而作者完成得确实不错，颇有启发性。

政治上，蒙元时代最为学者所关心的，即是皇帝专制是否加强的问题。据作者归纳，吴晗、牟复礼、陶晋生、周良霄、姚大力、张帆等学者都持肯定意见，认为有以下几点理由：一，成吉思汗的“家产制”国家；二，元朝时期主奴关系向汉式君臣关系渗透；三，士大夫“共治”观念削弱；四，廷杖等羞辱大臣人格之事屡见不鲜；五，权相少；六，约束君权机制削弱。

但作者也指出，包括傅海波、韦丝特、窦德士在内的学者则持否定，以为明朝的君权膨胀与蒙元经验并无直接关系，主要理由为蒙古的贵族合议传统以及元末的朝纲废弛。

作者认为，两种看法各有千秋，但都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一是元朝确实“主奴”色彩增强，“共治”观念较弱，皇权较少受制约，但君主专制的制度也未能长远维持。作者的结论是：“明太祖加强君主专制不是仿效元制，而是以元季政治的“威福下移”为殷鉴。但是，明代政治的残暴化则可能受到蒙元政治的直接影响。”

但我们还需注意到，即士大夫“共治”问题，首先需要有“士大夫”阶层的存在，并成为政府的中流砥柱，方可有“共治”，虽然本书对于“士大夫”在元朝的地位、人数、影响如何，未有探讨，但从间接的证据中，我们大概可以判断，士大夫作为一个政治势力，在元朝的中央政府应该是处于消亡或边缘状态，这可能比仅仅是“共治”观念的淡化，对君主专制的影响还要来得大。之后的分析，可从“士大夫阶层”在元明之际的政治起伏做探讨，以分析对皇权政治制度、外在的约束力问题。

在经济影响上，讨论的问题是，元朝是否延阻了宋朝蓬勃的经济发展。作者从人口入手，结合之前学者的研究，认为经济发展上并未出现“逆转”的现象，但确实加深了人口分布与区域经济的不平衡。作者在最后提出，应该在以后的研究中注意元明之际战争的破坏和明太祖的社会经济政策（受到黄仁宇的启发）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但我们或许也不能完全忽视元朝政策带来的消极作用，因为它可能是间接的，甚至朱元璋的经济政策，从长远上看，其肇因可能深埋在元朝之际，但进一步的判断都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以作为支撑。

第三项分析是社会层面的。作者谈到了元朝的三大制度：“根脚”、族群等级制度和户计制度。“根脚”制度是根据个人的家世晋用官员，若干皇室的家臣家族被认为是“大根脚”享有世袭的特权。“族权等级制”即所谓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分，造成的是“覆盖层化”现象，但中原原有社会结构不受影响。但作者认为，虽然汉族士人受害最大，但由于士人已经具有“地方菁英”色彩，权力与身份不完全来自国家，故从长远看并无重大影响。但笔者以为这只是就地方层面如此，我们也需注意到，士人除了是在地方上的菁英，也曾扮演着中央的菁英，即对全国政策有影响的角色，但元朝的社会政策显然将士人的全国性的角色缩减为了地区性的角色，从这一点上看，影响则不可谓不大。这是作者分析的疏漏之处。

但作者充分注意到了户计制度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户计制度即按照军、民、匠、站、盐、医、僧、道、儒等数十种分类，将百姓归为世袭的户役，不能更改。限制人民就业、迁徙的世袭身份制度妨碍了社会流动，与宋代的开放精神大相径庭。而这一制度又为明朝所承袭，构成了明清时代“停滞”的一层。影响殊大。不过受篇幅所限，作者没有详细分析户计制度的运行，就本书中其他篇目的零碎信息来看，户计制度似乎只要求一个家庭每代提供一人为户籍相应的职业，其他人可从事其他职业，但更多的信息则不清晰。

民族问题，关键在于民族的融合，按照中国传统的看法，本质在于文化的融合。作者判断，元朝各族交往密切，相互影响很深，但当时的蒙古、色目人并未真正汉化（这从前面的政治、社会上也可窥一二），真正的汉化要等到明朝建国以后，但我们或许也可以说，“汉化”与“胡化”是同时进行的。

文化层面，汉文化所受到的冲击在元朝前所未有，首次要与外来文化平等竞争。但是，外来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在作者看来并不大，主要体现在：一，世界观未能改变；二，外来科技影响肤浅；三，外来宗教未能吸引汉族信徒；四，中原学术、文学、艺术未受外来影响。至于原因，作者认为需从明太祖的本土化政策和宋代以来“文化内向”大有关系。而元朝时期中原文化确实也发生了变化，但作者认为与元廷的政策和外来文化并无关系。作者主要提了四点：道学确立为官学（但这确实是元廷的政策，与前文有矛盾）、俗文学的提升、文人主义的出现、文人画的兴起。最后作者的结论是，蒙元统治未能打破中国传统文化的硬壳，打破的不过是政治社会结构的一个角落，市民文化得以浮现。

但笔者以为，作者的分析存在疏漏和错误。除了道学与朝廷的关系先不论，我们除了关注元朝时期，非汉文化带来的新事物外，也应该关注那些由于蒙古人入主，而消失的现象。我们已知明初学术的浅薄，学风的空疏，这是否与元朝的统治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宋代所谓的“文化内向”，笔者已经在《中国转向内在》的书评中指出，这主要是就理学系统而言的，并不能概括中国文化的整体面貌，元朝的影响，是否体现在将其他文化取向的可能性压制，而使得理学系统突出，并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代表”？就审美与饮食上来看，我们从明初御膳、皇家的画像、民间的酒文化中，都能看到元代的深刻影响，这些是否与深层次的影响有关联？总的来说，以上的例子已经推翻了作者的判断，我们虽然未能得到一个新的结论，但是，重新考虑现有的证据，对元朝的文化影响做一次全面的评估无疑是必要的。元朝的影响可能比想象的要大。

现在看来，本文作为一种综合性评价的努力，成就虽大，但需要修正、再研究的地方也很多，这留下了继续发掘、探索的空间。